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推介]

大艺术观的模型构建——艺术介入乡村的观念革新、政策协同与实践转型协同机制研究

王嘉文, 蔡淑娟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 南京 210000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 本研究基于系统设计方法论, 构建“大艺术观三维驱动模型”, 以解决艺术介入乡村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断裂、主体缺位与生态失衡问题。模型以“自然地理生态层—本土文化基因层—外来力量协同层”的集成架构, 通过地理维度整合生态智慧重构修复人地关系, 本土维度激活在地文化基因实现乡土记忆再生, 外力维度建立多元流动艺术的多向赋权重构介入伦理。政策层面, 大艺术观与中国乡村的自然肌理、历史文脉深度契合, 形成系统性本土发展法则; 实践层面, “参与式乡建”“生态修复”等模式通过权力关系重构, 推动艺术与乡村的协同创新。研究表明, 该创新模型以整体性思维、系统集成方法为乡村振兴提供兼具理论创新与系统实践价值的设计范式。

关键词: 大艺术观; 三维驱动模型; 艺术乡建; 系统设计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946(2025)02-0115-08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5.02.014

Model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Art Concept: A Study on Conceptual Innovatio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for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Art Intervention

WANG Jiawen, CAI Shujuan

School of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work aims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Driving Model of Grand Art Concept" based on systematic design methodolog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ultural discontinuity, absence of local agency, and ecological im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The model adopt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comprising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cology layer—local cultural gene layer—external force collaboration layer." Specifically, it integrates ecological wisdom i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o reconstruct and restore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activates local cultural genes in the indigenous dimension to regenerate rural memory, and establishes mult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through diverse fluid artistic practices in the external dimension to reshape intervention ethics. At the policy level, the Grand Art Concept aligns deeply with China's rural natural fabric and historical-cultural context, forming systematic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approaches such as "participatory rural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acilita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art and rural communities by restructuring power dynamic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is innovative model, grounded in holistic thinking and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fers a design paradigm with both theoretical originality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grand art concept; three-dimensional driving model; artistic rural construction; systematic design

收稿日期: 2024-1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23AG016)

在城乡融合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语境下,中国艺术乡建正经历从“物质基建”向“文化—生态”协同治理的范式转型,强调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性与社会性。这种转型不仅是美学表达方式的革新,更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的深层修复与价值重构。传统的艺术介入模式往往陷入工具化困境——或沦为景观美化的装饰性工程,或退化为文化消费的符号化生产,难以回应乡村振兴对系统性价值重构的深层需求。大艺术观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乡土智慧、融合跨学科思维的认知框架,其核心在于将艺术视为“关系编织者”而非“形式创造者”,通过重构“人—自然—传统”的互动关系,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可能路径。本文试图论证:大艺术观并非抽象的理论假设,其本质是在地理梯度、文化主体与外来力量介入的动态平衡中,构建艺术介入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方案,最终指向一种兼具中国性与现代性的乡村发展范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政治议题的持续深化和美丽乡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等具体实施要求,艺术乡建作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作为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延续、还是符合当下国家整体战略发展需要,亦或是当代语境下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对社会责任的表达,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逐步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和乡村建设范式。

1937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深刻指出,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源在于“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这种“文化失调”本质上是传统乡土社会的有机结构遭遇现代化冲击后的系统性断裂。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乡民与土地的纽带逐渐松脱——从“面朝黄土”的农耕生计模式转向流动务工,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信仰体系、在地文化、宗族关系随之瓦解。这种转向并非简单的传统消逝,而是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在时空叠压下持续碰撞的复杂过程:费孝通所言的“乡土中国”中基于血缘地缘的“有机团结”,逐渐被城市化进程中原子化个体的“机械团结”取代,乡民既失去了传统共同体的庇护,又难以融入现代公民社会的权利框架,陷入双重脱嵌的困境。

面对这一历史性命题,大艺术观的理论价值在于重构乡土社会的组织生态:通过艺术介入激活“人—自然—文化”的互动关系,在生态修复中重建人地契约,在非遗活态传承中唤醒文化基因,在参与式设计中再造社群纽带。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延续至今的乡村问题,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中呈现出新的复杂性:一方面,部分项目

陷入“碎片化”(如孤立的文化墙绘)、“断裂式”(如脱离在地语境的装置艺术)困境,暴露出“有知识无体系、有方法无观念”的操作局限;另一方面,“艺术乡建”概念被泛化为标签,学界对其本质功能产生尖锐分歧——乡村是否需要艺术介入?艺术家应以何种角色参与其中?艺术乡建究竟是拯救乡土还是精英话语的殖民?^[1]这些争议直指核心命题: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遗产的资源化转化,又如何通过艺术重构乡土中国的未来图景?^[2]这种争论本身,恰恰印证了艺术乡建已从方法论探讨升维至文明范式抉择的深层思辨。

一、大艺术观的提出

(一) 作为艺术原乡的乡土

“大艺术观”作为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方法论,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学理溯源、内涵辨析、实际应用等方面展开。

关于“大艺术观”的学理溯源,现有研究主要从艺术观念、方法论、文化审美内核等视角切入。刘成纪^[3]从艺术观念史的角度研究指出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艺术核心在于其“大艺术”属性,即艺术与宗教、伦理、自然哲学、宇宙观等领域紧密结合的文化实践。这是一种泛文化艺术观,可以视之为中国“大艺术观”萌发起源。北大历史系教授朱龙华认为“大艺术观”是一种融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美学的综合性方法论,核心在于打破学科壁垒,将艺术置于更宏大多元的文明框架中,探索其在人类精神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徐复观^[4]以孔子庄子的儒道思想为轴,提出儒家礼乐与道家自然观共同塑造了中国艺术的“大传统”。以庄子虚、静、明为基本特征的心斋之“心”建构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

现有研究主要从审美观、哲学观等角度展开内涵辨析。丰子恺^[5]“大艺术”观念贯穿艺术创作、艺术理论以及人生践履,突破艺术技巧、单纯作品与日常情感的局限,指向人生,从而达至深广的大艺术境界。朱良志^[6]认为中国传统艺术哲学存在一种“以物为量、大制不割、小中现大和“一即一切”的“无量”艺术观念,即万物为一体、传统艺术浑一无分别又超越有限与无限的相对性,体现出圆满俱足的状态。国外学者对这一概念也有一定研究。美国学者约翰·杜威在《艺术作为经验》(*Art As Experience*)中打破了建立在传统哲学的本质论和二元论基础上的艺术观,恢复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美的艺术与实用艺术之间的连续性,将艺术观外延覆盖了人的整个存在,展现为“大艺术观”的内涵。

在实际应用方面,刘宗超^[7]、李海兵^[8]、周计武^[9]和胡俊成^[10]等学者分别从大艺术观与书法专业、设计教育系统、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和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大艺术观的指导作用。

当前的艺术乡建主要从“生态性”“治理性”和“美好性”三个方面展开研究,^[11]而梳理大艺术观的理论溯源和内涵,不难发现大艺术观概念是一个从中国乡土和传统文化中生长提炼出来的理论体系,其山水自然的文化特性和百姓宜居宜业的实践期待,与艺术乡建的研究特点和目标不谋而合。正如学者吕品田认为民间美术是真正的生活化艺术、大众化艺术,其内容和形式紧密地交融于民俗生活,有着超出现代艺术视阈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生态,并贯穿着一条体贴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体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精神之链”^[12]。也就是说,乡村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原乡,艺术的原乡在民间,这里的民间可以引申为地理概念上的乡村,也可以视作生态文化概念下的乡土。将民间美术、非遗技艺等艺术现象还原到中国乡土民俗生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加以整体把握,不仅反映历史的生存状态和价值构成,也代表着一种接续时下的文化立场和文明模式,预示着一种前瞻性的生活理念和未来道路。

(二) 大艺术观的理论建构

大艺术观是基于自然地理基质、本土空间构造、文化流动性传播共同形成的,大艺术观与乡村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不是现代话语下的建构想象,而是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在地性存续。中国乡村振兴正面临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张力——乡村既需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诉求,又须守护农耕文明积淀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基因。当前的乡建实践正在从表层景观美化转向深层价值重构,但学界尚未形成系统化解构多元矛盾的认知框架。在此背景下,大艺术观的理论建构呈现出迫切性与合理性:以中国三级地理阶梯的生态基底为空间载体,以“百工之制”“四时之序”等农耕智慧为文化内核,以全球化语境下的跨主体对话为创新触媒,构建起“自然地理生态层—本土文化基因层—外来力量协同层”的集成架构。这一理论为破解“千村一面”“文化悬浮”等现实困境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使乡村从“被书写的客体”升华为“自我言说的主体”。

从自然地理生态层审视,中国三级地理阶梯的生态格局深刻塑造着艺术乡建的空间形态。青藏高原的宗教艺术、云贵梯田的稻作艺术、江南水乡的园林艺术(见图1~2),本质上都是地理基质与人文实践长期互渗互融的产物。这种“非单一化”的地缘艺术特征,要求乡建实践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警惕单一标准化的美学范式

对地域差异性的消解。

本土文化基因层是在自然地理生态层基础上形成的。包括百工遗产与村民自主艺术在内的元素,构成了大艺术观的活性基因库。徽州木雕技艺的传承谱系、福建土楼的营造智慧、陕西关中剪纸的生活气息共同编织着乡村文化的意义之网,以技艺、仪式、符号等手段在代际间传承集体记忆(见图3~4)。这些从中国本土成长的文化实践具有双重价值:既是维护地方记忆的符号系统,又是抵抗文化同质化的实践策略。

外来力量协同层是通过技术、资本、知识或观念介入乡土系统的外部主体及其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艺术家、社会企业、学术机构、政府部门等,包括政府主导的坚持在地性、社会性与整体性的屏南模式,艺术家渠岩基于现代性反思和精神家园重建的许村—青田模式,企业参与建设的丹寨模式、高校师生主导的花田模式和结合国际经验的“艺术在浮梁”项目等(见图5~6),其核心特征为“异质性”与“流动性”,既可能激活乡村的创新动能,也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大艺术观要求外来力量在“地理自然约束”与“本土文化伦理”的双重框架下运作,形成“输入—转化—共生”的可持续介入模式。

因此,大艺术观是以中国农耕文明为文化根脉、以乡土社会为实践场景、以“天地人”和谐共生哲学为精神内核的综合性艺术理论体系。其突破传统艺术学科边界束缚,在“自然地理生态层—本土文化基因层—外来力量协同层”三维协同框架下,以跨学科融合(历史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为方法论,通过生态智慧修复、文化基因激活与多元主体赋权的辩证统一,重构艺术介入社会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与实践路径。

二、政策语境透视大艺术观的价值

当前乡村经历了最初(1900—2005年)对传统村落和文物进行静态保护下的虚空乡村基础阶段,到(2005—2016年)艺术促民生的现代化转换阶段,再到(2017—2024年)艺术赋能乡村的系统规划阶段。^[1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推进,乡村建设的核心已从早期侧重基础设施建设的物理空间改造,转向对人文精神重塑与生态系统修复的综合性关怀。面对城镇化冲击下文化断层与生态脆化的乡村环境,国家、地方和组织出台的政府文件着重表现了人文精神和生态保护之重要性,与山水美学内核下的大艺术观相契合。以大艺术观作为乡建的观念指导,与中国乡村形成于自然格局的特点、历史建构中传统的审美惯性相一致,它不单是方法论或局部艺术景观,还是一套与乡村发展相始终的运行机构与形态建构的本



图1 云南哈尼梯田



图2 苏州拙政园



图3 福建土楼



图4 陕西关中剪纸艺术



图5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图6 “艺术在浮梁”项目

土法则。

(一) 活化人文精神，助力文脉传承

国家政策体系对大艺术观的形成具有结构性支撑作用。2022年《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标志着艺术介入从文化工具论向系统价值论的转向，通过创意设计、手工艺等八大领域的制度性安排，构建起“艺术-产业-生态”的复合赋能框架。这种政策演进与2008年《中国景观村落保护公约》、2014年《传统村落保护指导意见》形成历时性呼应，在空间维度确立“物质遗存保护”与“文化基因活化”的双重标准，在时间维度贯通“历史记忆存续”与“现代价值转化”的发展轴线。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动态增补到“和美乡村”目标的提出，政策话语的迭代揭示出深层逻辑：大艺术观并非抽象理论建构，而是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空间治理技术、文化生产机制等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实践操

作系统。其核心在于将乡土文化基因的守护与再生产，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系统。

国家政策体系的迭代升级为大艺术观提供了制度性孵化载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例，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立的“抢救-保护-传承”三级框架，奠定了大艺术观“文化基因库”的底层逻辑；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推动的“功能转向”，则催化其向“服务当代民生”的价值维度延伸。政策演进轨迹揭示出双重转型：从“美丽乡村”时期（2013年）侧重物质环境整治的单向思维，到“和美乡村”目标（2023年）强调生态、人文、经济价值的系统整合，对应大艺术观从“艺术作为修饰工具”向“艺术作为关系媒介”的认知跃迁。特别是2022年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政策，通过“生产性保护+创新性转化”机制，为大艺术观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如非遗工坊认证体系

规范手工艺活态传承,区块链技术确权赋能传统技艺现代转译。这些政策工具的共同作用,使大艺术观超越文化保护的技术范畴,升华为统摄乡土价值再生产、生态伦理重构、城乡要素互哺的综合治理范式。

(二) 重视生态保护,构建美好生活

从单一的环境治理、村容村貌整治到人与生态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目标追求,当下的政策导向已从“环境应对”到“生态关系重构”的认知跃升。众多针对生态议题的政策出台帮助恢复山水田园的诗意栖居模式,达到大艺术观理想状态下的乡村和美发展。

国家生态战略的持续深化为大艺术观注入生态伦理内核,构建起“生态-艺术-发展”的协同框架。从2007年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到“双碳”目标的设定,政策导向逐步从宏观理念倡导转向具象实践。政策体系通过三重机制塑造大艺术观的生态维度:在价值层面确立“生态优先”原则(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在技术层面规范“绿色乡建”标准(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在制度层面,通过《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2016年)等政策工具创新“生态补偿机制”。这使得大艺术观超越文化振兴范畴,升华为践行生态文明、实现“双碳”目标的创新机制。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演进体系,为大艺术观的实践深化提供了制度性框架与价值导向。《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美丽乡村”建设目标,从空间治理维度赋予大艺术观合法性——其以“三生融合”理念为基底,将艺术介入定义为生态修复(如梯田水系艺术化整治)与文化遗产(如非遗工坊建设)的协同工具。而《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的“生态文明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协同建设”,则进一步强化大艺术观的系统性整合功能:通过政策设计将乡土文化遗产、生态价值转化、人居环境提升纳入统一框架,推动艺术介入从“文化修饰”升华为“关系重构”的治理范式。

三、大艺术观维度介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在中国乡村,乡村建设同质化现象显著、文化产业展示式微以及生态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找到契合中国乡土气质的艺术乡建道路,为艺术乡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指导,已成为当下乡村发展领域的关键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推进,艺术乡建更加需要突破传统的发展范式,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新型乡村文明。根据大艺术观的三

个核心维度:自然地理生态层、本土文化基因层和外来力量协同层,反思当前的艺术乡建困境源于三者结构的失衡:或固守地理决定论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或放任外来力量过分介入导致主体性文化流失,或追求形式的丰富导致价值杂糅和混乱。由此提出相对应的三个实践层次:“地理-水系-材料”的生态性耦合;“技艺-仪式-社群”的共生性传承;协作与边界的良性互动。通过在地理基质中激活文化基因,在本土叙事中容纳异质元素,形成具有张力和弹性的乡村艺术建设系统,使大艺术观真正成为扎根乡土的有机生命体,而非悬浮的文化拼贴物。

(一) 自然地理生态层:“地理-水系-材料”的生态性耦合

中国地理结构的天然属性奠定了大艺术观的生态基底。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地势——青藏高原的雄浑、云贵盆地的层叠、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舒展,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自然分野,更塑造了华夏文明“以山水为画本”的审美基因。山川脉络的天然切割和水系网络的自由延展,构成了无需人工建构的“艺术原境”,使得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始终根植于自然地理的直观体验。本质而言,各种艺术的表现都以“自然生态”为背景,加以人化的改造,通过人的认识、审美和活动形成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不论是在唐宋山水画“三远法”中凝练为视觉技巧,还是在江南园林借景手法中演化为空间叙事,都印证了艺术从自然生长而来的内在逻辑,艺术表现的“美”即是对自然的认知和生态空间的遵循。

中国艺术观的地理自然生态层体现为“地貌基底—水系网络—材料基因”的耦合,其本质是通过地理特征转译、生态能量循环与物质性能适配的协同作用,构建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对话模式。这一系统以“形”(地貌结构)为空间基底、“流”(水系循环)为能量网络、“质”(在地材料)为媒介载体,进而形成“自然语法—技术响应”的闭环逻辑。大艺术观在此层面的实践,是对自然原境的再发现与诠释。松阳陈家铺村将悬崖梯田的等高线转化为建筑轮廓线,以夯土材质呼应地理环境;景德镇陶溪川以废弃窑炉的残影重构“陶土—火焰—水流”的物质循环,皆是表现中国乡土艺术的空间逻辑根植于地理特征的本质的体现。这种“地理即艺术”的认知传统,使大艺术观超越了简单的景观模仿,成为人与自然深层对话的媒介。从地理本体生长出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大艺术观的核心在于发现而非创造。综合分析后得出的大艺术观自然地理生态层的实践理论建构如下(见表1)。

(二) 本土文化基因层：“技艺-仪式-社群”的共生性传承

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发端于村落空间场域,通过村民身教口传、技艺传承等方式代代相传,它融汇了地方精神脉络、村落历史记忆与日常生活,是一个文化集合体,在村落的存续发展中,构筑起独特的文化生态。中国艺术观的本土性根植于“物我共融”的集体记忆与“日用即道”的生活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形式美学”的范式形成鲜明分野。西方艺术乡建常以“他者凝视”重构乡村景观,如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壁画村强调视觉效果,而中国艺术观则追求“技艺-仪式-社群”的共生性传承。中国艺术观的本土性本质是通过物性传承、集体实践与文化治理的协同作用,维系乡土文明的连续性。这一系统以“物”(技艺载体)为物质基础,“事”(仪式实践)为意义纽带,“人”(社群网络)为组织单元,形成自治的文化生态闭环。

技艺作为文化基因的物质载体,是本土文化的物化表达和知识存储介质。徽州木雕匠人以刀为笔,将《二十四孝图》刻入梁枋,使伦理教化融入建筑肌理;福建土楼夯

墙时嵌入稻壳与红糖,以材料智慧回应湿热气候,实用与审美浑然天成。这种“生活即艺术”的传统,将美学生产嵌入日常劳作,揭示了本土美感的生成逻辑:美不是被观看的客体,而是生活实践的显影。

仪式作为集体记忆的活化机制,通过周期性展演强化文化认同,实现隐性知识的代际传递。陕西“社火”巡游通过形式感的展演,如黑色的脸谱符号代表铁面无私、不同高跷高度象征社会等级,重构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仪式实践将抽象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公共事件。

社群作为文化治理的组织单元,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网络构建自治系统。浙江“兰亭书会”以乡贤为核心,通过雅集(每年3月3日)审定村史编修、监督古建筑修缮。此类社群结构通过“非正式制度”(如乡约、禁忌)实现文化资源的自主治理,抵御外来干预对主体性的消解。

大艺术观本土文化基因层“物载道一事凝心一人聚力”的协同,形成了抵御文化断层的能力。该维度表明大艺术观本土文化基因层的实践不在于静态保护,而在于通过系统性创新实现文化基因存续(见表2)。

表1 大艺术观自然地理生态层的实践理论建构

理论维度	核心内涵	实践逻辑	具体案例
自然基底	地理结构作为艺术生成的“原境”,是文化生成的物理载体	以自然肌理定义艺术介入的边界与可能性	浮梁艺术项目:水系装置《共生》利用昌江水系支流脉络,将废弃陶片嵌入河床净化水质,艺术介入完全依附河道自然走向
形式语法	形态语法	将地理特征重构为空间叙事	松阳陈家铺村:悬崖村落的等高线决定建筑轮廓,先锋书店以“折线屋顶”呼应梯田肌理,形成建筑与地形的共生
	时间语法	将生产周期转化为艺术事件	景德镇陶溪川:陶瓷烧制季的窑火光影被设计为公共艺术展演,开窑仪式与节气文化绑定,形成“陶瓷生态时钟”
	材料语法	原材料的原生态生产,实现“地理基因”的物质转换	碧山工销社:徽州竹编技艺与夯土墙结合,用黟县青石板铺装院落,形成“材料-技艺-空间”的本土闭环

表2 大艺术观本土文化基因层的实践理论建构

理论维度	核心内涵	实践逻辑	具体案例
物性传承	以本土材料与技艺为载体,维系“手作一心传”的文化基因	将传统工艺转化为当代美学语言	碧山工销社:徽州竹编、木雕技艺与当代设计融合,开发“黟县青”石材茶器,村民以古法篆刻纹样重构器物叙事
仪式转译	民俗仪式升维为文化剧场,激活集体记忆的公共性	以艺术介入重构传统仪式的当代意义	贵州榕江“村超”艺术计划:侗族“祭萨”仪式转化为足球赛开幕剧,芦笙舞阵型重组为“人形比分牌”,实现信仰符号的活态传承
知识再生	重构乡土知识系统(农谚、历法、口述史),塑造地方性认知框架	以艺术实践激活隐性知识的显性表达	贵州茅贡计划:建立“乡土档案馆”,村民自主收集老物件、编撰《米谱》,将稻作知识转化为装置艺术与社区教材
社群共创	以村民为主体构建“技艺-生计-文化”共同体	通过参与式创作实现文化赋权	云南沙溪复兴工程:白族木匠主导古戏台修复,瑞士团队仅提供结构加固,传统榫卯技艺成为空间叙事核心语言

(三) 外来力量协同层:协作与边界的良性互动

外来力量指向携带异质文化基因的外部介入主体(艺术家、建筑师、社会企业等),其通过技术迁移与观念碰撞激活乡土系统,兼具文化催化与主体消解的双重潜能。大艺术观要求其介入必须遵循本土文化基底,建立外来智识与在地智慧的协作,在守护文化根性中实现创新转化。

乡村作为承载人类质朴技艺的原乡,其价值愈发凸显。激活乡村文化的价值,除了情感上的呼唤,更需要对主体性的把握。艺术乡建从“介入”到“参与”的实践转向,本质上是文化权力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标志着乡村从“被改造的客体”向“能动的主体”的范式转换。传统艺术介入模式常陷入“外来者中心主义”困境:艺术家以“救赎者”姿态植入审美符号,村民沦为文化生产的被动接受者,导致乡建实践悬浮于乡土社会的真实需求。而艺术参与的核心理念在于打破单向度的文化输出,重构艺术与乡村的互动逻辑,实现从“为他者代言”到“与他者共在”的伦理跃迁。

外来力量并非一味地介入本土文化改造,而是有一个伦理边界。福建屏南龙潭村要求外来艺术家驻村至少两年,通过“村民评议制”审核方案,确保创作不违背风水禁忌;云南沙溪复兴工程中,瑞士团队仅提供古建加固技术,木雕纹样修复完全由白族匠人依《木经》完成。这些实践印证:成功的他者介入需恪守“最小干预”原则,在文化张力中寻求创新共识。大艺术观外来力量协同层的实践理论建构如下(见表3)。

“自然地理生态层—本土文化基因层—外来力量协同层”三个维度构成了大艺术观的互动模型。自然地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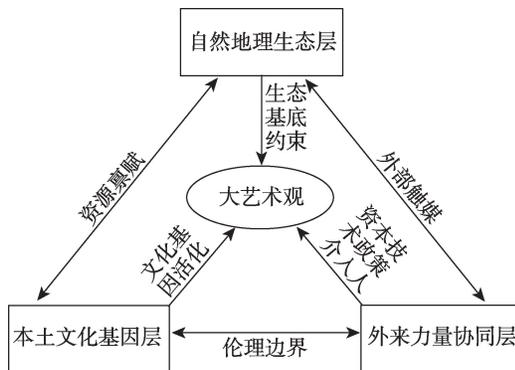


图7 大艺术观三维互动理论模型

态层是文化生成的物理载体与生态基底,其天然性决定了艺术介入的空间语法;本土文化基因层是乡土文明的精神内核,通过物性传承(技艺)、仪式转译(民俗)等方式维系文化根性;外来力量协同层是创新动能的外部触媒,以协作共生、知识共享等路径通过资本、技术或政策的介入激活系统的开放性,但需以本土文化为伦理边界。自然地理提供创作原境,本土文化确立价值坐标,外来力量注入变革势能,最终在动态调适中实现乡土文明的可持续演进。由此生成的大艺术观三维互动理论模型如下(见图7)。

四、结语

本研究是中华文明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创造性回应,也是以系统动力学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艺术介入乡村现状的回应,凭借艺术语言的转译功能,在传统基因与现代性诉求、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文化网络、个体创造力与共同体价值之间构建弹性连接,最终指向一种“诗意栖居”的新型文明形态。这既是农耕文明生态智慧的当代延续,亦是技术时代人类精神家园的重构实验。

本文建构的“自然地理生态层—本土文化基因层—外来力量协同层”大艺术观三维互动理论模型,突破了对传统乡建经验的依赖,系统揭示了艺术乡建的底层逻辑,支持了中国乡村振兴从“文化修补”向“文明再造”的范式跃迁:以生态智慧修复人地契约(地理维度)、以文化基因激活主体叙事(本土维度)、以伦理重构平衡介入张力(外来维度),三者协同形成乡村“非断裂式”转型的动力学机制。该创新模型通过整体性思维与系统集成方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兼具理论创新价值和系统实践意义的复合框架,不仅有效规避了梁漱溟所警示的“文化失调”现代性陷阱,更突破了西方艺术介入乡村的“景观殖民”路径,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辩证张力中,实现了艺术介入乡村振兴的系统转型。

表3 大艺术观外来力量协同层的实践理论建构

理论维度	核心内涵	实践逻辑	具体案例
协作共生	打造良性的协作网络	外来文化、技术、方法论融入本土文化气质	陕西袁家村:以合作社模式,村民共同经营小吃街和手工艺店,外来企业负责品牌推广
伦理边界	最小干预原则	通过制度、法律等手段平衡创新动能与伦理底线	福建屏南龙潭村:外来艺术家创作需要驻村至少两年,通过“村民评议制”审核方案,确保不违背风水禁忌
知识共享	将隐性乡土知识(如技艺口诀、生态禁忌)转化为可传播的资源	以可视化、数字化手段实现再生产	江苏周庄古镇:将传统水乡婚俗转化为互动剧场,游客参与仪式,村民传授习俗细节,增强文化传播效应

参考文献

- [1] 邓小南,渠敬东,渠岩,等. 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J]. 学术研究,2016(10):51-78.
- [2] 方李莉,向丽. 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未来:与方李莉的对话[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4):118-125.
- [3] 刘成纪. 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徐复观. 艺术的想象[J]. 中国书法,2008,(5):63.
- [5] 王潇宁. 丰子恺“大艺术”观审美超越性质与现代启示[J]. 艺术研究,2023(3):47-49.
- [6] 朱良志. 论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无量”观念[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5):45-59.
- [7] 刘宗超. 大艺术观与书法学科专业建设[J]. 大学书法,2023(1):32-34.
- [8] 李海兵,李文欣. 5G时代背景下设计教育的大艺术观[J]. 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0(4):14-20.
- [9] 周计武. 新文科的使命与艺术学理论的跨学科定位[J]. 民族艺术研究,2021,34(1):126-133.
- [10] 胡俊成. “大艺术观”视域下我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理念探析[J]. 智慧农业导刊,2023,3(19):167-172.
- [11] 方李莉,向丽. 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未来:与方李莉的对话[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4):118-125.
- [12] 孟繁玮,缙梦媛. 专访吕品田:时代变革中的价值洞察与实践把握[J]. 美术观察,2018(12):28-31.
- [13] 蔡淑娟,付绮齐. 中国“艺术乡建”研究现状、理论热点及知识谱系分析(1900—2023)——基于CNKI数据库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的应用[J]. 创意与设计,2024(2):5-16.